



台灣佛學研究的扎根者

——聖嚴長老談周宣德居士

◆本刊採訪／聖嚴長老 口述

我與周宣德居士的互動，可以說開始得很早，也可以說開始得很晚，因為我於民國三十八年從大陸到台灣，當我退伍的時候，已經是民國五十年了，總共有十二年的時間，之後就在中華佛教文化館，跟我師父東初老人學習。

那時，周居士很努力地推展、帶動大專青年學佛，並且非常迅速地從台大、師大、政大，然後一直推廣到全台灣許多大學，成效很好。這不僅需要花錢、花時間，還需要花心力來照顧這些學生，實在很不容易！

有一次，他借中華佛教文化館辦活動，我代表我的師父東初老人接待他們。周居士非常客氣，請我講開示，其實那時我才剛剛出家，有什麼好開

示的，就只能算是跟大專學生們見一下面吧。

周居士跟東初老人的關係滿密切的。譬如，他的皈依師父是智光老和尚，而智光老和尚是東初老人的師父，所以東初老人跟周居士之間可說是平輩的關係，只不過一個是在家弟子，一個是出家弟子。此外，東初老人提倡影印大藏經，他也是發起人之一；還有「中華佛教文化館」的英譯名稱，也是他翻譯的。所以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周居士是非常熱心的一位菩薩。

有一次我對我的師父說：「周居士這麼熱心，在居士之中，很少有這樣的人，可以說僅僅只有他一個。」師父卻回答我：「你不知道嗎？基督徒都是這樣熱心傳教的。」我很

驚訝地說：「周居士不是佛教徒嗎？」師父說：「他曾經是基督徒，但現在是佛教徒，而且是一個虔誠的三寶弟子。」因此，我注意到周居士在跟我們互動的時候，不會稱自己是弟子，而是自稱「僕人」，這真是滿特殊的，因為一般居士跟出家人互動，都自稱「三寶弟子」或是只稱「弟子」，而「僕人」這個名稱，實際上是基督徒對上帝的自稱。

以我個人來講，與周居士的互動中，有幾件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。第一件是我準備去山裡閉關時，他來問我準備要閉關多少年？我回答他：「愈長愈好，至少三年。」他說：「古來的許多大師們都閉關，印光大師、太虛大師也曾經閉過關，閉關是好事。那你打算要學哪一位大師呢？」我說：「我沒有要學哪一位大師，我學釋迦牟尼佛。」他又問：



「閉關可能會很辛苦喔！你有信徒嗎？」我回答：「沒有，我只有一個人。不過，智光老和尚對我很慈悲。」於是他告訴我：「有困難的時候記得要向智光老和尚講。」這是我跟周居士之間的一次互動，印象十分深刻。

後來我去了日本留學，期間很少回台灣，即使回台灣，也很快就再到日本去，因為沒有人支持我。台灣佛教界對我是抱持著一種非常負面的想法，認為我去了就要還俗、結婚。但是周居士卻請智光老和尚「多照顧這個年輕人」。

除了對台灣各大學的學生

學佛運動非常重視之外，他也非常鼓勵研究佛學的青年。有一次，我回到台灣的時候，他請我參加他們的粥會，當時慧炬佛學會熱心的居士們大概都參加了，而且這些居士都是有著高知識水準的菩薩，真是所謂「往來無白丁」。周居士當場

向大家說：「今天在我們慧炬社的都是『師父』——法師、工程師、律師、醫師……數了好多『師』，我們在座的都是『師』。」接著他就向大家介紹我，之後頒發獎學金給我，這分「密勒佛學獎學金」大概是五萬元，對我來講，這筆錢是不少的，因此我非常感恩他。

後來我又到了美國，就很少跟周居士接觸，不過在美國佛教會每個月都可以看到《慧炬雜誌》。而周居士與美國佛教會的沈家楨居士之間



也很熟悉，還送了美國佛教會一尊觀音菩薩像，這尊像是用珍珠串成的，送到美國的時候，我也在現場。我跟慧炬雜誌社一直是不即不離，雖然沒有直接的關係，但因為我是美國佛教會大覺寺的住持，所以周居士到美國的時候，都由我負責接待。

雖然我的師公智光老和尚沒有辦學或講學，但是對周居士的感召力非常強。師公是非常重視教育的人，因此也影響他重視教育，但是在當時要怎麼辦教育呢？周居士的方式，

就是運用原來已有的大學體系來培養佛教人才，在各大學成立佛教的佛學社團。那個時候要辦佛學社團滿辛苦的，因為必須向各大學校方保證不談佛教而只講佛學，並表示佛學只是一種哲學、只是一項文化思想，而不是宗教。周居士還真是用心良苦，做了這樣的承諾之後，許多大學才紛紛成立佛學社團。儘管如此，這些佛學社團仍然很不容易接觸寺廟，而出家人也很難進入。

佛學社團所發揮的功能，對大專青年的影響非常深遠，一直到現在，這些佛學社團的許多成員，都是社會的中堅分子，雖然我們無從得知他們現在是不是還在學佛，是不是還在護法，但是佛學的種子已經種在他們的八識田中，他們會對佛教有影響，而這就是潛移默化的作用，能夠感化很多人親近佛教。

在這之前，台灣的年輕人，特別是大專生，大多數都

認為佛教是迷信，不值一顧，大家覺得只有基督教才是有水準的，因此，在胸前掛上十字架，說自己是基督徒，那是非常時髦的事；但如果大專生是佛教徒的話，就很丟臉了。可是，經過佛學社團打下基礎之後，年輕人漸漸地知道佛教並不只是老太太們才信仰的迷信宗教，而是有內涵的，這也可說是將台灣的學佛及佛教學術研究的風氣打開來了。

當我從日本留學回台灣的時候，佛學社團已經非常地普遍了，可是那時候教育部認為出家人不可能做研究，只能念經。所以我在文化大學教書前，拿我的畢業證書到教育部去申請教師證，被教育部連續打回三次，還說：「和尚怎麼會有學問呢？還教什麼書呢？」這真是對和尚非常大的侮辱。可是在民國六十四、五年那個時候，因為周居士在大學佛學社團扎下了根基，之後有許多人專門研究佛學，也有

許多居士在大學裡教書，而教書的人還可以拿到教師證，像周宣德居士、周邦道居士都在大學教過書，那為什麼我這個和尚就不能教書？那其實是對和尚的一種歧視。直到第四次，我才請我們的駐日單位寫信回來給教育部，證明我的博士學位是真的，日本文部省是承認的，這樣教師證才拿到了。這件事說明了當時台灣幾乎沒有從事研究工作的出家人，所以一般人只知道研究佛教的大概都是居士。關於居士研究佛教這一點上，周居士的貢獻很大。

我要對慧炬雜誌社的菩薩們讚歎：周居士成立了慧炬雜誌社，雖然硬體的建設並不大，財產也不多，但是由於他打下的基礎，凝聚了年輕人及學者們在那裡共修、討論佛法，以及發表學佛心得，因此大家很感恩慧炬，也很珍惜慧炬。周居士並沒有直接收徒弟，這些人都是跟他學佛的學

生，可是這些學生之中，有許多人是忠心耿耿，生死不渝，對於慧炬雜誌社全心護持、學習與回饋。

周居士已經往生了二十年，大家還是凝聚在慧炬雜誌社，讓慧炬雜誌社繼續地發光發熱，繼續地淨化我們這個世間。而慧炬雜誌社從最初簡單的一個雜誌社，發展成出版社，還有出版物，我覺得周居士在生時的付出是值得的，雖然他沒有想到自己往生以後，慧炬雜誌社會不會繼續維持下去，可是實際上慧炬雜誌社每天都還在運作，這真是不容易。

對於慧炬，我也寄予厚望，儘管慧炬沒有雄厚的財力，但是慧炬永遠凝聚了一批知識分子，我相信慧炬雜誌社未來一定更能將它的精神內涵充分發揮，並且持續、持久地保持下去，這對佛教而言，就是一分希望，就是一分力量，就是一分功德。🕉